军事战略

美军十三年作战的六大战略教训

□ 刘晋豫　刘硕扬

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对战争剖析和反思的开始。随着撤离阿富汗，美军开始对从2001年到2014年13年间所进行的战争进行剖析和总结，通过反思，美军总结出了六大主要战略教训。

教训一：缺乏战略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军方的有效沟通。

战略的制定需要政府与军方之间充分有效的沟通。在过去13年所进行的战争中，美军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为进行战争所制定的战略以及出台的政策和决策，往往收不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反思，美军认为，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美军违背了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必须是军方与政府之间围绕现实的政策目标以及有效的战略预期而进行良好的交互合作的客观规律。在13年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围绕战略制定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认为战略的制定是一个线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官的职责是制定政策和战略，而军方的职责则不过是围绕这个战略，制定相应的策略，并实现由文官所制定的战略目标而已。还有的认为，战略的制定，应该根据总统的偏好来进行，等等。正是这些对于战略制定艺术的片面认识，导致了美军战略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军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不能娴熟运用战略制定的艺术，带来了诸多战略和政策目标不能完全得以实现的恶果。

教训二：缺乏政府与军方之间就战略如何实施所必需的共识。

美国传统观念认为，制约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总统自身的领导能力；二是总统战略制定团队的经验；三是领导团队成员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通过对于13年战争的分析，美军发现，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通过军方与政府中文官的有效合作，制定战略，只是取得战略预期效果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战略目标，还需要军方与政府就如何实施战略达成共识。美军战略目标到战役目标的形成过程是，首先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然后以此为依据，制定国家军事战略，并根据国家军事战略制定《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最后制定地区战役计划、具体的战役和战术计划。在确定战略目标时，总统离不开军方的意见，但军方与总统关注的焦点往往不同。总统所关注的是如何在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实现平衡，如何配置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其决策的政治影响是什么等问题，而军方则更多地是关注最终的决策结果。因此，当战略制定后，军方往往感到没有得到足够的战略指导，而总统也会感到，他没有得到足够清晰的战略决策建议。这种状态，反映了美军军方与政府之间在如何贯彻战略方面存在分歧，这也是导致13年战争期间美国诸多战略目标未能得到有效实现的重要原因。

教训三：缺乏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的有机统一。

总结13年战争的教训，美军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缺乏与军事战略有机统一、卓有成效的政治战略，缺乏对于政治战略中心作用的深刻理解，缺乏政治战略的有效运用以及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有机统一，是13年战争中美军的一个惨痛教训。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制定者及战略家们脑海里的狭隘战略观。这种狭隘的战略观集中地表现在，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美军的将领，都更多地关注战争本身和反恐作战，进而将其主要关注仅仅放在击败敌军的军事挑战，防止基地分子对美国的攻击等具体目标上。因此，在13年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军队确实成功地锁定和消灭了许多恐怖分子，但美国并没有实现其使东道国政府有效控制国家的政治战略目标。相反，一些国际政府的行为反倒更加助长了恐怖分子的气焰。出现这一重大失误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美国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功的军事行动都是在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特定的政治联系中进行的，都离不开对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关系的深刻把握和精准理解。缺乏科学的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所确定的战略目标也往往难以得以实现。

教训四：缺乏对于军事科学技术作用的全面认识。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然而，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军产生了巨大的战略判断失误，那就是随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新型通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的兴起，美军认为高技术的发展可以取代军事人力。这种认识被1991年海湾战争实践所强化。在海湾战争中，美军运用精确制导弹药、全球通信系统和无人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实现了更为精确地获取目标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引导常规作战力量，更为有效、更为彻底地摧毁这些目标。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更是将海湾战争作为未来战争的模板。由于过分强调高技术在作战中的作用，使得美军忽略了对于作战对手社会、人文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研究与把握，以至于美军军官在后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发现，这两个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陌生。通过对于过去13年作战实践的分析，美军认识到，不论作战对手是谁，要在作战行动中取得主动，都必须对于对手的历史、领导人、民众对于国家及政府的忠诚度等问题，有一个精确的把握。没有对作战对手的这些非军事问题的深刻把握，仅仅依靠高技术及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要想取得彻底胜利是十分困难的。而美军恰恰由于对于战争所存在的狭隘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大错。

教训五：缺乏对于进行战后维稳军事行动重要性的认识。

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试图有意回避战后维护稳定的问题，美军也没有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进行战后维稳军事行动，导致战后美军在不得不进行维稳军事行动时，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及有效的准备。导致这个失误的原因与美军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美军从来都不愿意进行长期的作战。通过对于13年战争的反思，美军现在认识到，在战后初期，抓住任何反对派能够组织起来之前的“黄金时间”，利用军事力量，迅速展开部署，做好维稳军事行动的准备，才是避免后来不得不大规模、长时间展开部署，开展维稳军事行动的灵丹妙药。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在战前做出周密的计划，更需要根据部队战后可能遇到的法制缺失、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进行有效的准备和针对性训练。战争的教训还表明，为了尽快实现战后的稳定，应该尽快有效利用当地的力量。这一点也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后维稳军事行动的实践所证明。

教训六：缺乏打造联合作战体系的有效准备。

2001年以来美军所进行的13年战争，基本上都是采取跨国联合作战的方式进行的。美军认为，在这个方面的教训主要是，未能有效建立符合跨国联合作战需要的统一的指挥体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在跨国联合作战中，只能更多地依靠各参战方的单打独斗。通过对于战争的总结，美军还认识到，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许多军事行动中，要建立这样的联合指挥体制，仅仅依靠美军自身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来自军政府的有效支持。美军强调，到目前为止，美军还不能依靠军事法规的力量，实现跨机构以及联盟间的统一指挥，对现代作战中的一体化协调行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未来美军建设，特别是跨国联合作战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军队建设

走在战争前面

□ 赵勤轩

“走在战争前面”早有人提出，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往往是军事技术进步多少，军事学术落后多少。战争史上，古代战争经过冷兵器时代、黑火药时代、滑膛枪时代。20世纪以来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二战达到顶峰。战后是导弹核武器时代，恐怖平衡的冷战。海湾战争被认为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分水岭”，此后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战争形态的变化不取决于一两件新技术新武器，是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持续相当长时间。新的世纪之交的战争，依然处于信息化时代。把握战争形态的变化，这一点往往要经过战争实践的反复验证。朝鲜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打几个大歼灭战，但美军地空机动能力极强，志愿军用一个师围歼一个营都围不住，只能改为“零敲牛皮糖”战术。毛泽东尚且要经过实践才能把握战争形态变化，纸上谈兵的军事名家只能望尘莫及。

走在战争前面，不能脱离战争实际，跟着西方媒体标新立异的舆论走。军事名家提出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废除了“前线”概念，战争已发展为以“斩首”为核心，打击经济设施为重点，摧毁敌国人民意志为根本的全新模式战争。其实美军没有废除“前线”概念，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研究智能无人运输系统，旨在为军队提供更实用和可替代的直升机，“快速支援前线作战行动”。“斩首”也不是新东西，中国古代“擒贼先擒王”就是“斩首”。还有人提出未来战争是“制脑权战争”，把美国科幻电影当成现实。

网络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但不是军事斗争的主战场。军事名家说“美国和西方从机械化到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完成社会形态的进化”，“其发动战争的观念和样式也随之发生质变”；“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在这种新型战争中，传统陆海空军的坦克、飞机、导弹成为最后出场的演员。战略性大战场已到了虚拟网电空间。国家传统的地理和物理边界名存实亡，战争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战争化趋势明显”；“网络时代攻心为上的新型战争已经兵临中国城下，那些还在故纸堆里和历史的幻觉中沉湎于‘联合作战’和超视距攻击的职业军人们，已经到了更新战争知识系统的时候了”；“军队乃至战争的较量，最终是文化的较量”。

网络作战是在军队建设和作战中应用网络技术，不是以网络为载体的舆论宣传。美国既是互联网的缔造者，也是网络战的始作俑者，新版网络战略明确把“网络战”用作针对敌人的作战方法，对网络攻击进行报复，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美军“网络战”，是通过木马病毒程序侵入对方网络，造成对方网络物理设施瘫痪。美军网络司令部成立5年来，建设了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其中13支保障美国本土免受网络袭击，68支防止美国国防部网络免受攻击，27支提供一体化网络支援，25支为国家任务队伍和战斗任务团队提供计划和分析支持。军事名家把网络战理解为“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未来战争主战方式是所谓“网络舆论战和信息思想战”，不符合美军网络战的概念，脱离战争本义和军队职任。美国2015年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提到中国是“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南海岩礁造地“正在加剧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美国“有可能部署跨越国际海上交通线的军事力量”，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性正在增加”。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指出，“军队使命和战略任务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安全”；“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可以预见，未来面临的战争还是核武器背景下常规武器的信息化的局部战争。在美国将飞机军舰派往南海，日本宣扬参加美军在南海的巡逻、侦察和反潜，菲律宾加速扩张军备的形势下，鼓吹未来主战样式是攻心为上“网络舆论战和信息思想战”，无异于解除我军的武装。这不是走在战争前面，是走向战争反面。

技术标准可能陷入的困境

□ 张翼燕　蒯佳佳

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近期发布公告，称中国在众多高科技特别是ICT（电子信息）领域制定本国技术标准，此举将使中国在ICT领域技术和市场脱离全球技术标准规范，难以打开国际市场，进而陷入“加拉帕戈斯孤岛效应”的困境。

本土技术标准发展现状

目前，国际上50万个技术标准构成了全球技术市场的潜在基础。这些技术标准规范了产品的设计、操作、生产以及兼容性，架起了市场和技术间的桥梁。

虽然国际技术标准已存在，但中国仍坚持在本国高科技领域特别是ICT领域制定本土技术标准。其范围涵盖了3G移动通信服务业、无线局域网络、加密技术及物联网领域等。不可否认的是，短期内这可以增加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就长远来说，这种固守本国技术标准的做法将会使技术创新水平落后于其他国家，并可能陷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综合征”困局。

世界上一些国家曾深陷此技术标准困境，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日本。早期，日本曾将一些国内技术成熟的电子产品与国际市场隔绝，并坚持采用本国的技术标准规范第二代和第三代移动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顶尖移动电话制造商的涌现，如NEC、松下和夏普。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公司在国内市场独占鳌头，但在国际市场上鲜有人问津。由于只固守本国技术标准，导致竞争力削弱并受到世界市场孤立。日本制造业，尤其是IT产业深陷“加拉帕戈斯群岛综合征”的惨痛教训应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固守本土技术标准带来一定风险

从长远来看，中国固守本国技术标准的做法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它使中国的ICT技术和市场脱离全球规范，与世界ICT市场隔绝并阻碍了这一标准在自愿性、国际化、一致性的基础上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如下。

采用错误标准将导致市场崩溃。中国采用本土技术标准生产的光盘播放机无法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无法播放国际上通行的DVD模式。最终导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光盘播放机市场的崩溃，约40%公司破产。

制定技术标准滞后将错失市场良机。中国直到2008年才将3G移动服务引入国内市场，滞后国外至少六年之久，导致移动设备创新和生产带来的潜力无法充分发挥，给中国的移动电话制造商造成了数十亿的巨大损失。

形成错误概念将疏于开拓更大的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隐藏了一种本质性的错误观点，认为国内消费者数量约有10亿，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且潜力巨大，足以支撑本国ICT产业的独立发展。但实际上，90%的ICT市场存在于中国之外。中国仍需开拓一个更大的国内市场并占领更大份额的国际市场，以此来推动ICT产业的长足发展。

囿于本土技术标准将惨遭“加拉帕戈斯孤岛效应”。即使成功地制定了一系列本土技术标准，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会加剧本土技术标准与全球技术标准的脱节，削弱其竞争力，向海外拓展市场将面临着重重困难。进而陷入日本当年所遭的孤岛效应。这种不利影响持续的时间会比日本更长，因为中国国内市场比日本大得多。

制定可持续发展技术标准

中国的ICT产品迎合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但与国外用户的需求相差甚远。这就要求中国积极融入国际ICT市场，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从长远来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决策者应重新审视技术标准的制定，尤其是要冷静对待近来盛行的“抵制国外技术”的态度。

应在制定标准和框架过程中采取开放模式，以透明、开放和非歧视的态度对待市场参与者；应摒弃阻碍标准制定的政策，推动标准制定公开化；应将本土标准制定和国际标准制定结合起来，在实用性原则的前提下，参照国际标准并提高对国际标准的认可度。大力支持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的制定，参与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制定技术标准的实践中去，促进ICT产业形成共识性的技术标准。

◆资　料

加拉帕戈斯群岛综合征

加拉帕戈斯岛位于南美大陆以西1000公里的太平洋面上，隶属于厄瓜多尔。该岛与陆地相隔遥远，通过自身进化的种族会形成赖以生存的固有生态系统，当陆地的外部种族进入该系统，免疫力低下的固有种族就会灭绝或是面临着灭绝的危机，“加拉帕戈斯群岛综合征”一词也由此引申而来。该术语生动地描述日本的制造业和IT产业曾面临的窘境。该国的IT产业自初期就发展起了独具本国特色的技术、服务和产品，然而它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就违背国际标准和世界市场的需要，从而陷入孤立的境地。但该词也常被用在因没有跟上世界市场趋势而深陷困局的情况。

新概念新法则

为科技人才营造更好环境

□ 田晓冰

近日，科技部人才中心在京举办“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人才规划纲要》）促进科技人才发展”座谈会，来自科研单位、企业、有关部门和地方的专家、学者、企业家、领导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国家人才规划纲要》实施的第五周年，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结构不断优化，以“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为代表的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成效非常显著。但要建成人才大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仍有部分问题尚待解决。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周国林提出，人才发展面临着三大问题：人才培养和引进问题、人才激励问题和人才环境问题。培养或引入高层次人才，完善激励机制以及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十分必要的。美国的科技能够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优势就在于高层次人才多、美元地位高和创新意识强。推动国家发展，除了需要延续性创新型人才，还需要颠覆性创新型人才。周国林认为，要营造更加有利于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必须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科技人才管理法制化建设。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表示，面向未来，人才规划的落实应转变观念，只重视人才是不够的，还要强调人力资源的概念，人才作为资源，应有效开发配置，并为经济服务。人力作为市场要素来说，需要研究不同类型的规律，不能一概而论。引入人才也要避免急功近利，避免简单攀比，即过度强调经济性。对人才的引进要根据竞争需要来制定政策，最顶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此外，我国的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在人才交流这方面也应打破体制障碍，营造科学无边界的氛围，适度提高人才薪酬，减少人才流失，将中国融入到全球科技市场中，找到更多符合中国发展的人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战略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锐认为，要完善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机制，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建立鼓励创新创造的分配激励机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奖励制度改革等。中科院人事局副局长苗鸿认为，要从机制上降低对人才流动的束缚，人才流动起来才能够遴选出高端的人才，要为人才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培养出国际的领跑者。

科学技术部人才中心主任李普认为，要在促进人才资源配置、推动跨界学术交流、促进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齐向东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不惜一切代价引进颠覆性创新人才，对这些人才的高投入是有价值的，能够让公司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会上有专家认为，我国应鼓励45岁以上专家继续为科技事业而奋斗，同时，也要给予年轻人才更多机会，帮助其解决与发展相随的一系列问题，为其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升人才的安全感，改善机制，减少人才流失。同时与国际接轨，在流动中发现更多优秀人才。

会议综述